

新 潮 集

张
契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新
集
...

新潮集

张 镔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新潮集

张 锲 著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隆 昌 印 刷 厂 印 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850×1168毫米32开本 10.75印张 3插页 230千字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书号: 10355·826

定价: 2.55元



——作者像——

目 录

序

答《人才》杂志编辑部问(代自序)	1
写时代的强音,做生活的强者	13
龙城赋	17
觉醒了的大地	43
上海,祖国瞩望着你	50
向土地索取财富	55
北京,你应该更美丽	68
愿青山常在,绿水长流	79
千湖之省	86
从卫星影像图上看西北半壁	94
被历史推向浪尖的人们	103
百事不成的“博士”	119
比一百还要多的故事	136
“愿效老牛,为国捐躯”	145
一对科学之宫的探珠人	154
话剧《祖国之恋》跋	162
他带着这点儿欣慰走了	165

啊，黄河，母亲河！	170
莫听穿林打叶声	173
度尽劫波兄弟在	178
陨星、名星及其他	180
新竹高于旧竹枝	182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	184
说“狂”	187
说“混”	194
民族魂 英雄志	197
欢乐之歌 光明之歌	203
诗贵真情	208
人，是复杂而具体的	213
球迷说球星	221
乡情浓于酒	224
热 流	229
后 记	338

答《人才》杂志编辑部问 (代自序)

一、你在创作上的主要成就：

我在崎岖曲折的道路上，已经摸索行走了几十年，至今还谈不上有什么成就。

从十四、五岁起，我就在报纸上发表过诗和短文。以后，还一直在继续学习着写诗、写剧本，也写散文、小说和报告文学。我写得不算少，发表的却不算多，已经发表的也都没有什么象样的东西。我比较为人们所熟悉的作品，是长篇报告文学《热流》，（获一九七七——一九八〇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长篇小说《改革者》（获《当代》文学奖）、电影《最后的选择》以及话剧《祖国之恋》等。对于这几篇东西，我也有过短暂的自我陶醉，但过后就越来越不满意。在创作上，我只爬过一些低矮的小丘，真正的大山还耸立在我的前面，我还得从山脚下开始往上攀登。

二、幼年、少年对您影响最大的人：

迄今为止，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是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读书不多，小时候上过私塾，以后还在一个女子中学里念过半年书。她的两个兄长，都很早就参加了革

命。其中一个一九二三年在上海由瞿秋白同志介绍入党，后来还到苏联学习过，一九三三年在江苏组织武装暴动时牺牲。他是我母亲心目中的英雄。多年来，母亲一直保存着我这位舅父牺牲前写给她的一封信。

母亲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勤劳刻苦。我的家庭，在我曾祖父、母和祖父、母一辈中，还是很富裕的。以后便逐渐衰落了下來，地和房子都卖的卖了，当的当了。到我记事时，家里已经沒有一间房子、一亩地，只好经常寄居在亲戚家里。母亲不甘心寄人篱下，才和我父亲找了个小学教师的职业，餬口谋生。我的父亲忠厚善良，但生性懦弱，家庭生计主要是靠母亲维持着。解放前后，母亲总共生了十二个孩子。我有一个姐姐、五个妹妹、一个弟弟，都因为解放前家庭生活窘困、贫病交迫死去了。我的父、母隔一段时间，就要换上一个学校，挪动一个地方，我也就跟着他们到处奔走、流浪。那时，我母亲的最大愿望，似乎就是能积攒点钱，赎回几亩地，盖上几间房子，垒一个安稳的小窝。为此，她除了教书外，每到一处都要租上两、三亩地，种点烟草、红薯、玉米等。这些劳动，都要挤在早、中、晚课余时间进行。父亲身体很不好，地里和家里的活儿都由她一人承当。这样，她从早到晚几乎就没有一点儿喘息的机会。直到现在，我还能记得她那时满脸汗垢、泥污，在地里给烟叶打杈、捉虫、培垄的情景。可是，不管她怎样累死累活，直到解放前夕，仍然没能实现自己那点可怜的愿望。

母亲给我留下的另一个深刻印象是：宽以待人。她已经在1981年夏天去世了。解放后，她为党工作了三十多年，做过合肥市郊区妇联主任，还做过一个联合仓库的主

任、门市部主任等，是一个模范工作者，出席过安徽省工交、财贸群英会，还是主席团的成员。现在我回想她的一生，从没有听到她埋怨过谁，苛求过谁。她总是很能体谅别人，处处替别人着想，却很少想过自己。我很早就离开她身边，工作后又很不顺利，一直没能对她尽到孝心，却总是从她那里取得各种各样的支持帮助。近几年，我的生活条件逐渐好转了，她在物质上仍然从没有对我要求过什么。她把一个个孩子操持长大，直到临终前仍然觉得对孩子们没有完全尽到责任。

三、在您成功的道路上，有哪些特点帮助您：

我常向一些同志说：我是个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作者。这并非客套话。如果说，我也还有什么值得一提的，那就是：我觉得自己还算是一个不甘心向命运屈服，并且多少懂得了点韧性战斗的人。我过去认为，至今也还认为：别人用一倍努力可以办到的事，我用三倍努力大约也可以办到。

四、哪些弱点阻碍了您：

还需要更加果敢的决断，应该有计划地安排时间、有目的地调整自己的生活节奏。

五、做您这项工作应具备哪些性格特征：

热爱生活，热爱你周围的人和事；

用一颗童心看世界，上了当也不灰心；不怨天尤人；

顽强学习，顽强实践，不怕失败，并且善于在失败中吸取经验，总结教训，继续前进。

六、您在一生中性格变化的重大因素：

我小时候很聪明，读书很早。先跟我的父、母上学，十一岁考进家乡安徽寿县中学。因为家境不好，到我十五岁参

加革命时，只断断续续地上到初中二年级。这中间，还跟过我的堂外祖父和堂舅父补习过两年古典文学。我那时很顽皮，是他们用鸡毛掸和戒尺帮助我背诵了一些散文和古诗词。有的至今还能背诵。这对我以后从事文学创作很有好处。

我是在淮海战役正在激烈进行的隆隆炮声中参加革命的。先在寿县独立团的文工队里做文工队员；后来到蚌埠市当过粮站的调运员、保管组长、财务组长、工会专职干部、市委办公室的干事、驻厂工作员、报社的文艺编辑组组长等。和我们整个国家一样，五十年代初期也是我的生命史上一个黄金年代。那时，我在省、市报刊上发表了一些诗和短文，在地方上小有名气。除了文学爱好以外，我还是市工人篮球代表队的队员，市里的中、长跑冠军，机关和市里的业余合唱队的指挥，有时自己也登台表演独唱和朗诵诗歌。总之，我已经听惯了各种各样的喝采声、鼓掌声，认为在我的前面，一定是一切都很美好的锦绣前程。

一九五七年，我在蚌埠报社工作期间被错打成“右派”。从此，我便从一个小小的荣誉的峰顶上跌落了下来。我从一个被不少人认为是“年轻有为”的青年干部，变成了人人都不屑一顾的“阶级敌人”。我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我不能再从事编辑工作，也没有条件再进行写作了。在这段时间内，我搞过许多种最繁重的体力劳动：种过地，拉过粪，运过矿石，喂过猪，当过业余兽医，也管理过葡萄园，培植过果树，等等。有一年多时间，我就住在一个总共不过三、四平方米的废弃不用的小厕所里，屋里塞满了粪桶、打扫厕所的竹扫帚、拖把等杂物。我的工资也被降

到最低一级，每月只能拿二十多元。那几年，正是我们国家处于因天灾人祸而造成的困难时期。几乎一切能够勉强填饱肚子的“食物”，我都尝试着吞吃过：烂菜帮，用稻壳子酿酒的酒糟，拉粪途中从地里拣拾的带冰冻和泥块的胡萝卜头……我甚至还在附近一家农场饲养员的半公开的“包庇”下，偷吃过喂牲口的马料。

这些意外的、沉重的打击，给我带来了痛苦，也给我带来了好处。有的好处，甚至是一生也享用不尽的。它使得我不仅能够适应顺境，也初步学会了适应逆境中的生活。即使在那种环境下，我也没有真正颓唐过。我在那间不过三、四平方米的小厕所里，用墨水瓶做了个小煤油灯，每晚拖着疲惫的身子劳动归来，仍然在拚命地读书自学，那间小厕所也有意想不到的优点，就是绝没有人去拜访我、干扰我。我还得学会怎样才能不被忧伤和愁闷压倒。我是个爱说、爱笑、爱唱的人，沉默对我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突然间我连一个说话的对象也无法找到，周围全是警惕的、戒备的眼睛。于是，我不得不学会在肚里哼歌，没人的时候就大声歌唱。因为我相信自己那些问题总有一天会得到澄清。我有很多缺点和错误，但我爱我们的党，爱我们的国家，我不是“阶级敌人”，也没有反过党。此外，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也尽量把交给我的劳动活儿完成得很好。我是个特等强劳力，拉车一天来回走一百二十里。从早到晚，我丢下这样活儿，就拾起那样活儿，很少有闲下来的时候。我学兽医，管理葡萄和果树，都不是领导交给我的任务，是因为看到猪病了兽医很难请，葡萄园荒芜了没人管理，自己偷着钻研、实践，后来才渐渐被人承认的。这样，我在那几年不光进一步锻炼出一

副强健的体魄，还学了一些特殊的劳动技能。在那段时间内，我感到最难忍受的是可怕的社会性孤立。我完全能够懂得那些对我冷淡以至歧视我的人。在当时的条件下，把我们调换个位置，我也会那样对待他们的。然而，我是多么希望人们能够理解我、能够多少倾听倾听埋藏在我心底里的声音啊！

一个秋天的傍晚，我赶了一大群猪去荒湖滩里放牧。周围看不到一个行人，天气阴沉沉的，我感到心头一阵凄凉，（请今天的读者原谅我当时一刹那间的软弱，简直失去了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我突然感到生活是那样灰暗，那样没有意思，似乎无论我多么努力，都无法赎回连我自己也闹不清楚的那些“过失”。我只剩下母亲这唯一的亲人了，可我又不敢也不愿把我已经成为“右派”的消息告诉母亲。我想着、想着，心里难过极了，不由得轻声唱起歌来，开始唱得很轻、很低，以后就越唱越大。我看到远远地走来一个孩子，这是一个大约十二岁左右放学回家路过湖滩边的小男孩，身上还背着书包。他走到离我二、三十米远的地方，就停下来不走了，站在那里听我唱歌。我是个蹩脚的歌手，唱了几十年的歌，甚至还当过业余合唱队的指挥，却很难得能把任何一个歌子唱准确过，但我有时唱得很动感情，至少在那天傍晚我是唱得很动感情的。我唱了一个又一个，那个小男孩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听着。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当着任何一个人的面大声唱过歌了，现在居然有人那么认真地听我唱歌，虽然他只是个孩子，对我也是很大的安慰和支持。我唱得越来越起劲，把蓄积在心里的痛苦，一点点都吐了出来，心里轻松多了。直到暮色渐浓，我才不得不把猪群收拢准备

赶回去。那个小男孩缓缓地走到我的身边，冷不丁问道：“叔叔！你怎么唱得这样忧伤？！”我吃了一惊，这么大点的孩子，他懂得什么叫“忧伤”呢？！看样子，他最多不过是农村小学四、五年级的学生，“忧伤”这两个字他也许刚从书本上看到，或者听到别人说过。我诧异地问他：“你懂得什么叫忧伤吗？”他点点头：“懂！”我是个爱流眼泪的人，那几年却很少哭过，因为我知道：哭是无补于事的。那天傍晚，我终于又痛痛快地哭了一场，把所有的愁闷、忧伤和对前途的失望心理，都用滚热的泪水洗得干干净净。在我的曲曲折折的生活经历中，这只是一件很小的事，但我却常常记起这件小事。我从这件小事里，更加懂得：人和人之间是需要相互理解的。当人们遇到特殊的困难、感到孤立无援时，多么希望有人能够理解他、向他伸出援助之手啊！哪怕你什么也不能做，只是认真地听他唱完一支悲伤的歌，允许他在你面前痛痛快地哭上一场，也要比完全无动于衷的冷漠要好。从前我是一个十分粗枝大叶的人，很少看重朋友们给予我的友谊，经过那几年痛苦的磨练，我才把友情看得更重要，我变得更加喜欢交往，朋友也比从前更多了。

一九六二年，我被摘去“右派”帽子。一九六三年初，我被调到蚌埠市文化局专门从事剧本创作。由于创作准备不足，我在一开始就又遇到困难。我所写的第一个剧本是把陆游的钗头凤的故事，改编成地方戏曲剧本。文化局长是一位对我始终很关心的老领导，连她看了剧本也不得不摇头说：“不行！实在不行！”我的第一个剧本就那样被轻易地否定了。可我没有灰心，还在继续不停地学着写剧本。那以后，在不到两年多的时间内，我先后改编和创作了七、八

个剧本，有京剧、话剧，也有安徽的地方戏曲。今天看来，虽然没有一个值得保留下来的，当时却都得到了上演的机会。到了一九六六年上半年，我已经成为我们那个城市产量最高的剧作者之一。我有一个戏在上演，一个戏在排演，还有一个戏在创作，那年我只有三十出头。正当我在拼命写作，想要有所作为的大好时刻，紧接着就赶上了十年动乱，我和当地的许多文化工作者一起，在经历了一番反反复复的折腾之后，都被送进了“五七”干校。

一九七三年，我重又调回文化局。接着便被北京电影制片厂借调来京，修改一个电影剧本。这个剧本，我和另外两位同志一道，前后共改了三、四年，至少改了十几次稿，加上采访笔记写了上百万字，还是没有改成。在修改剧本期间，目睹“四人帮”及其在文化部门爪牙的种种倒行逆施，出于义愤，也由于偶然的机遇，我和贺捷生、白桦、范曾、韩瀚等同志一起，又秘密参加了一场向中央领导同志控告“四人帮”罪行的斗争，差一点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直到粉碎了“四人帮”，我才得到了政治上的第二次解放。一九七八年，我过去的“右派”问题得到彻底改正，至此，我才又走上了一个新的、能够比较顺利发展的阶段。

七、你在前进的道路上有哪些体会：

回顾我在建国后这三十多年来走过的道路，我有这么几点体会：

一、我个人的命运始终是同党和国家的命运紧密地联在一起的。什么时候党和国家的事业得到顺利的发展，我个人的发展也就快一些、平稳一些；反之，当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出现曲折，我也就跟着遭殃，跟着出现颠簸。正因为这

样，我也越来越深切地感到：今天这种安定团结、蓬蓬勃勃的政治局面得来不易，我们必须尽全力维护它、发展它。

二、任何一个人的成长，都离不开周围同志、师友的帮助。我也是这样。近年来，我多少发表了点东西，还成为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戏剧家协会的会员，曾得力于不少前辈和同辈的帮助、支持。这里，我想特别谈谈几位编辑同志对我的帮助。编辑和教师、教练、导演等经常同在幕后工作的人一样，都是用自己心中的火去点燃别人的心，用自己的生命去为别人照亮道路的人，他们所消耗的大量劳动常常是不为人所知的。

一位是已故的北京电影制片厂编辑田庄同志。他是一位普通的编辑，过去和现在都很少有人知道他，但却有几位有影响的作家是得到他的帮助开始露出头角的。我认识他时，正被那个已经折磨了我好几年的电影剧本闹得焦头烂额，不光是别人，连我自己也对未来的创作渐渐失去信心，当时田庄同志挤出业余时间帮助我一遍遍地修改剧本。在厂里谈不成，就请我到 he 家里去谈。田庄同志常和我争得面红耳赤，他该肯定的就肯定，该否定的就否定，决不退让半分。但是，他又总是非常注意保护我的创作积极性，想尽方法让我认识到自己的长处，使我增长信心。他当时已经患了肝病、糖尿病等多种严重病症，动了几次大手术，自知不久于人世，竟然还用幽默、诙谐的语气给我写了一首热情洋溢的诗，这首诗，我今天还保存在手边。他一生坎坷，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著作，只留下了作者们对他的深深的怀念。

另一位是《人民日报》的袁鹰同志。在将近五、六年之久的时间内，我所发表和还没有发表的几乎每一篇作品，从

刚刚有个大体构思开始，都曾事先向袁鹰同志讲述过，得到过他的指点。我想写的许多东西，并不是准备投寄给《人民日报》的，在我的“右派”问题尚未改正之前，当时的《人民日报》也很难发表我的稿子，但不管我想写什么，他都能耐心地听完，并且认真负责地提出意见。我这个受惯了人们歧视、蔑视、漠视的人，在他那里觉得是平等的、温暖的。因此，我每次从他那里出来，就好象身上注入了新的力量。近二、三年，看到他工作很忙，我每次前去，他都要放下手中要写的稿子和要校阅的大样和我说话，我感到很不安，便自觉地去得少了些。他每次见到我，都还主动询问我又有什么新的创作计划。据我所知，我并不是唯一的这样经常去打搅他的人。曾经写过话剧《哦，大森林》的中年作者都郁同志，直到现在还完好地保存着他在中学时代袁鹰同志写给他的一批信。

还有一位是《当代》杂志的孟伟哉同志。我认识他时，政治上的处境已经转好，创作上的压力却仍然很大。八〇年夏天，当我捧着又一次修改完毕的话剧本《祖国之恋》的打印稿前去看他时，自己也不抱有任何希望。没有想到：他看后立即决定采用。有一天夜里，天气很热，我在十点半钟路过他家，还看到他正打着赤膊在灯下一字字地替我审定稿子。那时他的眼睛很不好，一边改稿，一边还擦着眼泪。他自己也正处于创作旺盛期，大量时间却都花在为别人看稿、改稿上。用他的话说：文学创作事业的人手总是越多越好。做为一个编辑，每看到一个新的作家出现，一篇好的作品发表，往往比自己写了好东西还要高兴。

此外，《当代》杂志的秦兆阳同志，在帮助我修改《热